

• 社会学研究 •

# 从村庄生计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和关于 “民族复兴”的社会学<sup>①</sup>

刘能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从《江村经济》伊始,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历时态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命运的关注和反思。本文希望以“民族复兴”这个概念为切入点,将费先生对历时态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命运的关注,纳入一个特定的时空社会学框架之中进行解释。论文具体分析了如下五重历时态:(1)1911 [1840]—1949,两半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对应的是费先生早期的村庄生计研究(以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为代表);(2)1949—1978,历时30年的制度性隔离(以及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的多重结构性牺牲[structural sacrifices]),对应的是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到取消的学科命运和当时代重要社会实践的历史演进;(3)1979—2008,改革开放和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应的是费先生提出的发展模式论(其主要理论要素为内生发展模式的多样性);(4)文化自觉作为消减中国悖论(经济上的融入与政治上的怀疑)的一个理论范式,对应的是费先生在文化欣赏与文化接纳这两个概念基础之上,对中国现代性崛起的国际公共关系策略的战略思考;(5)从文化自觉到制度重构,对应的是延续费先生的这一战略思考,如何在后费孝通时代继续推进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以便真正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村庄生计;文化自觉;费孝通;历时态全球化;结构性牺牲;制度隔离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20)04-0049-07

## 一、前言:从村庄生计到文化自觉

近年来我写的纪念费先生的文章,主要是沿着江村调查所开启的村庄生计研究的脉络,所做的一系列回顾、总结和展望<sup>[1][2][3]</sup>。《江村经济》一书的核心主题之一,是在论述20世

纪30年代中国东部富庶地区的乡村经济在遭受当时全球化压力之下的本土社会回应<sup>[4]</sup>。20世纪40年代云南三村调查,实际上包含两重深刻的期望:一个是方法论上的,也即费先生所说的社区比较分析方法,寻找在经济发展链条上与江村处于不同位置的基层社区作为个案,试图从理论上论证,在外部全球化力量冲击下,地方工商

收稿日期:2020-02-17

作者简介:刘能(1970—),男,浙江嵊泗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

①谨以本文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

业发展和商品化的程度,经由地权集中度的中介,最终解释了乡土社会中农户经济破产的水平<sup>[5]</sup>。这两重期望合在一起,实际上表露出来的,是一个通则性理论的建构企图。1957年的二访江村,实际上是费先生对新型经济制度下相对萎缩了的农户生计模式的一次诊断<sup>[6]</sup>;但这一诊断背后的理论立场,却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相对立;在当年反右运动中因此受到冲击,标志着他社会学职业生涯的重大中断。

恢复社会学之后,沿着生计这个核心议题,费先生又提出了解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镇企业崛起的模式论,以及视野更为宏大的区域发展理论<sup>[7]</sup>。受费先生这一长期学术关注点的启发和引导,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本人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生计模式变迁,一直保持着切近的观察:如1992年春季的天津静海县乡镇的非农化转型研究、1996年初在苏浙两省环太湖地区关于乡镇经济依托本土优势的多元化发展模式的调研、1996年夏天对浙江东部地区和湖北中部地区城镇化模式的调研<sup>[8]</sup>、1997—1999年对山东济南郊区产业格局变迁的调研<sup>[9]</sup>、1999—2000年对河北白洋淀湖区外来工业迁移引进的调研、2006年对宁夏石嘴山回族社区的规模农业规划的田野调查、2007—2009年对北京郊区城中村房屋出租经济的田野调查<sup>[10][11][12][13]</sup>,以及2015年在腾讯基金会支持下,与同事一起对贵州侗族社区围绕文化旅游议题的创业努力做了持续观察,等等。

这一持续观察让我日益体会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环境性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1994年分税制引发的财政体制改革对基层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基层政区“撤扩并”对基层行政资源分配格局的影响;取消农业税政策对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影响;以及林权制度改革和确权对农户经济理性的持续影响,等等。进入21世纪,生态旅游概念的提出、互联网技术商业应用潜力的扩散(尤其以淘宝村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等等,又为乡村社会的生计模式探讨提供了新的元素<sup>[3]</sup>。

文化自觉则是费先生学术生命的后半段着力投入关注的议题。对于费先生来说,生计研

究,主要关心的是“怎么富裕起来的问题”,而文化自觉,解决的则是“富裕起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社区中找到中国位置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费先生一生的学术关注点,都是在为中华民族何以安身立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因此,我就找了这么一个框架,叫做民族复兴的社会学,通过把费先生的生平,跟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的将近180年的历史结合起来,以一个学者的生平来透视这一段历史性进程。

## 二、个人生命史和民族生命史的契合

我首先想要表达的,就是费先生个人生命史和民族生命史的契合。从时间角度看,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视角。费先生的生命史,从1910—2005年,无论对于民族和国家,还是对于其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时段。具体来说,费先生在自己的生命起点,就直面了宏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巨变: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屈辱史在甲午战败和辛丑条约签订时达到顶点,同时也意味着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等早期回应的战略失败。1905年前后,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改良努力,包括君主立宪考察、尝试设立各省谘议局等。其中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的,便是教育领域的巨大变迁(取消科举制度、新式学堂和留洋)、海外华人社区的财政支持和民权观念的兴起,与当时青年激进化(革命化)之间的制度性关联<sup>[14][15][16]</sup>。从费先生自己的生平来看,他的童年实际上经历了一系列的文化选择,包括上新学还是上旧学,皈依新文体还是旧文体,进入新机构(如新式学堂)还是旧机构,等等<sup>[17]</sup>。

在费先生的青春期和职业养成初期,他面临的便是北伐、政局一统和中国社会的早期现代化:首先,他依次所处的高等教育场所(包括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本身就是体现早期现代性的典型社会场域(比如当时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就是跟世界交流之后引进来的一个新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吴文藻、帕克和史禄国等人对他的学术影响。其次,费先生的大瑶山调查,就是在史禄国教授的

坚持下,结合了当时的广西省政府对于行政辖区内少数民族民情调查的需要(简称边政)而产生的<sup>[18]</sup>。从费先生当时所写的《桂行通讯》<sup>[19]</sup>的点滴中,可以看出这一调查本身就是民国政治中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瑶山调查因为意外事故和爱妻的殒命而不得不中断,而这又给了费先生与早期现代性的另一次亲密接触的机会:他所选择的疗伤之处,远在故乡太湖流域的开弦弓村(后来改学名为江村)及其生丝运销合作社,恰恰是早期全球化压力与中国本土社会回应之间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到了费先生职业素养和学者身份建立的时候,也有一系列线索让我们重新认识:首先,就是英伦求学经历和他最终选定研究自己所在复杂社会这样一个人类学范式转型的事实。尽管当时英国传统人类学面临转型压力,但费先生本人因为留学这一跨文化交流经历,也许对这一选择产生了一定影响。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费先生毅然踏上了回国参加抗战的道路,经过越南到达昆明,到云南大学和其恩师吴文藻会合,直接领导了呈贡魁阁团队的建立,并推进了一系列专门调研议题,如云南三村研究、劳工和工厂研究、基层行政和政权研究,以及边境集市研究等<sup>[20]</sup>。20世纪40年代的旅美经历,是费先生个人的再次跨文化交流经验<sup>[21]</sup>。这个阶段另一个重要事实,便是他为了生计而成为专栏作家,成为当时著名的政论家,是他作为独立思想者的养成,再往后就是他“民主教授”身份的获得。

新中国成立以后,可以说,费先生个人的命运、学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已经紧密勾连在了一起。费先生曾在国务院专家局工作过。专家局的设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安排中,是作为沟通党和知识分子媒介的作用的。1952年学科调整以后,社会学作为学科被取消,学科所属的专业方向全面收缩,费先生参与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政策研究,多少还算专业性工作。伴随着“双百”运动的开展和反右扩大化,最终结局便是一代社会学家学术活动的中断和知识资源的荒废。从学科视角来看,也许是很糟糕很负面的,但这一阶段其实是奠定当代中国之结构性命运的一个起点。从1950年朝鲜战争

爆发开始,国家其实就已经陷入了决定命运的一个结构性路径依赖,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深思熟虑之后,中国决定派兵入朝参战,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苏式国防工业生产线的引入,实际上也就是苏联重工业化模式的引入,中国农民很快就变成了工人。还从苏联邀请了大量专家,因为搞计划经济是一个新东西,需要学习和引入苏联的经济管理模式。因此,朝鲜战争的爆发,事实上改变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讨论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而迅速地转移到苏联的重工业模式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中去。因此,可以合理地去作理论上猜想的便是,紧接着的农业集体化,甚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否都与这样一个结构性路径依赖有关。这一点,可能是再回顾看过去60年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慢慢被认识到的一个视角。

接下来就是拨乱反正、“社会学要补课”和行行重行行。费先生自己说只有10块钱(意思是还有大概10年时间用于恢复和发展社会学),但是我们最终看到他用完了25块钱。1984年发表《小城镇大问题》,直接指向基层社区发展萎缩这一症状: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集镇人口没有大增长,经济规模也迟滞不前<sup>[22]</sup>。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费先生学术工作的主轴,便是对当时出现的多样化发展模式的总结,从早年的社区类型比较,扩展到了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总结和归纳: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再到边区开发、浦东开发,等等。在这一建立在各地发展实际的理论提升工作中,其实有一个要重点指出来的,就是发展要素论。除了前面总结出来的几个大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之外,费先生后期在各地不断发掘出来的小型模式(如民权模式),都符合发展要素论的特点:其中的一个主要叙述框架,叫“公司+农户”,这个叙事模式,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集中的资本、知识和技术标准,与分散的劳动力、小型的原始积累之间建立在经济优势互补和市场风险互担基础之上的一个结合。

然后就到了世纪之交,我们看到一个老人文化反思的历程。其实我认为有一篇文献——《孔林片思》<sup>[23]</sup>——是最早展示费先生文化反

思念头的。我个人认为,大约在 1997 年之前,费先生其实已经在经历一个从发展论过渡到文化论的转型。他的问题非常简单,“富裕之后怎么办?”。因此,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文化世界、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背后是什么?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国际政治事件:从费先生的行文当中可以看到,苏联的解体、海湾战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对于这些巨变,我们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扮演什么样的政治角色,便成了一个引领风气的学者心目中根本性的学术追问。

至此,我们可以说,费先生的个人学术史本身就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发展和延续的一个整体,先做生计和发展的学术,再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最后是在文化沟通、文化欣赏和文化共处。这里面涉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逻辑形象的问题,中国发展模式正当性的问题,以及美美与共大局观所隐含的全球和谐相处的问题,这一些都是大家能看到的。

### 三、生存主义现代性/自我拯救的现代性和历时态全球化

我尝试提出一个类似“时间总体性”(time-totality)的概念,用以指称 1840 年以来中国国家(或中华民族)所经历的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的整个时空历程。其实之前已经有韩国首尔大学的社会学家张庆燮,提出一个概念叫“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sup>[24]</sup>。那么针对中国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这个文化特定性或文化嵌入性,我们能不能用其他概念来界定呢?我现在尝试提出两个定义,一个叫生存主义的现代性(survivalist modernity),一个叫自我拯救的现代性(self-salvationist modernity)。其中第一个概念来自 2017 年 11 月份,在北大社会学系召开的第五届中韩社会学论坛上,我和韩国首尔大学另一位社会学家金洪中教授的私下讨论:他把韩国现代民族国家成长和上升的历史轨迹,用生存主义现代性来加以概括,用于刻画大韩民族在长期遭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遭遇下,不屈不挠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整个历程。第二个概念则是我

本人对 1840 年以来将近 180 年间的中国现代性成长过程的概括<sup>[25]</sup>。

历时态全球化的界定。在本文中,历时态全球化指的就是过去 180 年里,中国“生存主义现代性”或“自我拯救的现代性”所展开的一系列历史性结构背景,主要涉及西方工业化进程的历时演进及其相伴随的社会文化表征体系的全球扩张,以及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制度化回应。前者至少包括了如下五个层面:(1) 理性、效率、最大化、科学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神圣化;(2) 西方教育体制、科学体制和经济组织模式的全球扩张;(3) 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金融市场和全球评级机构等经济统治模式的全球霸权;(4) 消费主义的兴起和消费文化符号的全球认知架构和认知扩散;(5) 冷战、军备竞赛、意识形态竞争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流动性结盟。

仅以流动性结盟这个趋势来看,过去几十年间,中、美、苏(俄)三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实际上构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分化成以美欧和苏联集团为代表的两大冷战集团。如果说 1945—1949 年的中国内战和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中国被直接归入苏联集团的话,那么 1960 年的中苏交恶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美苏两霸直接对峙的国家。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和美欧的关系解冻;中国开始和西方世界发展起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为中国和西方阵营奠定了 10 年蜜月期的基础,直至 1991 年的苏东剧变。较为新近的态势是,随着 2018 年 4 月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中俄接近的战略格局日益明了。

### 四、五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和费孝通的学术回应

接下来,本文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去看,针对我们识别出来的过去 180 年间的五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费先生是如何以自己的学术生命来做出回应的。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分析,奠定我们把费先生的社会学称作“关于民族复兴的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证据。

第一重: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11 [1840]—1949

第一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所嵌入的社会特定性(societal specificity),包括四个前后接续的亚时态,分别是:(1)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两半社会;(2)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努力(洋务运动);(3)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4)1928年政局一统之后的白区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生存主义现代性/自我拯救现代性的实质表现,包括了一系列的社会实验和探索:同光中兴、甲午海战失败、辛亥革命、北伐、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并引导中国革命、白区的官僚资本主义化、币制改革和金融危机、解放区/边区的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和大生产运动[合作化运动]等等。

费先生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学术回应主线包括两条:一条是以《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这两篇名作,对全球资本主义侵袭下中国本土手工业体系瓦解和乡村生计体系破产的进程做出了机制的解释和历史的记录,并且由此提出了以工农相辅作为应对这一危机的社会解药。另一条则是诸如《生育制度》<sup>[26]</sup>、《乡土中国》<sup>[27]</sup>之类的理论建构,试图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视角,结合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体认,试图对中国社会形态和制度实践做出理论解释。

第二重:30年的社会经济实验,1949—1979

我们识别出来的第二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是1949年以来历时30年的多项社会经济实验,包括:(1)1952年朝鲜战争以来突然推进的重工业化进程(它改变了原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改造的历史进程)和由五年经济计划所推进的计划经济模式;(2)农村地区1957年开始推进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这一相互接续的庞大社会实验;(3)1960年代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使得中国同时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三线建设、两弹工程;(4)1970年代末的经济困境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进程。

费先生这个时期的学术生涯,由于院系和学科调整等制度性原因,早期是投入民族识别工作以体现应用社会科学的价值;中期则是典型的学术剥夺,末期则是在政治氛围逐渐转好

等待学术生命重启。看起来这似乎是令人扼腕的空白。但事实上,恰恰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略的实施,奠定了中国生存主义—自我拯救现代性的一个独特结构性特征:制度独立(或制度隔离)。到现在,我们在国防工业领域仍然得益于制度隔离(如武器禁运和高技术转让的禁止)而导致的自力更生的国防体系的全方位建设。包括北斗通讯体系、量子通信技术、无人机技术的领先和战略导弹的体系化,都是极好的例子。联想到近期美国所发起的贸易战试图对中国新兴高技术产业实施战略狙击,也许最后的结局又是另一个制度隔离前提下推动的制度独立和自主创新的事实。

第三重:1979—1999 [最长延续至2008]

第三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的主体时间历程是在1979年到1999年,但其潜在影响一直延续到2008年:这一阶段的国家实践包括:(1)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和经济特区建设;(2)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1994年分税制];(3)产权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可视为非典型趋同全球化的一个特殊案例];(4)中国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关贸总协定到WTO谈判]和文化体系[举办奥运会]。从现在的回顾来看,这20年(或30年)的重要事实,便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概念作为中国现代国家政体合理化进程的主旨这样一个根本意图,也是目前我们讨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议题的一个重要行政和政治基础。

费先生这一时期的学术回应,主要是以发展模式论为最显著的学术成果,其中:(1)苏南模式:集体产权制度优势的延续;(2)温州模式:个体经济行动者动机的促发和理性化;(3)珠三角模式:国际市场要素分工和中国被整合进国际商品链条[commodity chain]之中;(4)区域开发论:区域经济要素的合理化和互相配合,结合国家政策的支持,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四重:1999 [最早追溯至1989]—2005

第四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其实就是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危局,以及由此促发的费先生对于中国如何在国际关系格局中自处的问题。因此,费先生这

个时期的主要学术回应便是:假如中国社会的经济崛起是无可阻挡的,那么我们的后续危机和挑战将会出现在哪里?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他从发展模式论过渡到文化自觉论的开端。发表于1989年的《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sup>[28]</sup>、1997年的《反思·对话·文化自觉》<sup>[29]</sup>、2000年的《文化自觉 和而不同》<sup>[30]</sup>,以及2004年的《“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sup>[31]</sup>,这一系列著作的意图,实际上就是在为解决中国人、中国社会和全球社会如何相处开药方。与此同时,我对这一系列作品的解读,还包括以下两点:首先,要在文化欣赏与文化接纳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现代性崛起的国际公共关系策略做战略思考;其次,这一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和费先生学术工作的主要联结,表现为文化自觉作为消减中国悖论[经济上的融入与政治上的怀疑]的一个理论范式,具有道德上的高尚性。

第五重:2005—现在一切近的将来[near future]

第五重历时态就是2005年以后到现在,再到切近的将来,针对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格局中,继续发扬费先生的学术传统、学术思考和学术资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斯人已逝,但他的学术力量和学术光辉仍然辉照四方。可以概括出来的努力方向之一,便是如何将文化自觉的战略空间推进到制度重构的领域,也即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如何延续费先生的战略思考,在后费孝通时代继续推进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以便真正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五、结 语

把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生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并置,用于说明社会学科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理念,可以与一个文明体的自我图强和自我拯救的历史轨迹交相呼应。从总体上来看,制度隔绝[institutional segregation]和结构性牺牲[structural sacrifices]是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至关重要的理论概念,而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全球共赢治理结构的制

度重构,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制度化手段。在这一语境下,费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和美美与共16字箴言,为这一制度化手段的具体化和操作化,提供了战略意义上的理论指导。其中有三个理论要素值得特别关注:(1)制度独立性/制度隔离+结构性牺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学解释的内生理论要素;(2)制度自信+国际政治经济制度重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学解释的外生理论要素(“一带一路”作为替代性全球经济秩序的道德意涵,以及人民币地位的提升与美元霸权的衰减,便是这个理论层次的实践演进);(3)文化自觉+跨文化理解和交流+文化接纳/文化欣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战略。文化软实力概念下推进的孔子学院计划,虽然效果还有待评估,但无疑是这一文化战略下的一个操作性步骤。

## 参考文献:

- [1]刘能.重返空间社会学:继承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J].学海,2014,(4).
- [2]刘能.费孝通和村庄生计研究:八十年的回顾[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 [3]刘能.村庄生计研究:历史脉络和当代情境[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1).
- [4]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 [5]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 [6]费孝通.重访江村.费孝通全集:第8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 [7]费孝通.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
- [8]刘能.乡镇行政体制的一次解剖.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 [9]刘能.等级制和社会网络视野下的乡镇行政:北镇个案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 [10]狄雷,刘能.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成过程的社会学考察:一个城市空间转型的个案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1).
- [11]狄雷,刘能.异质性社区的社会交往与社区认同:北京沙村的个案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 [12]李蔚,刘能.外来流动人口的身份建构[J].重庆社会科学,2015,(3).

- [13] 李蔚,刘能. 流动人口居住空间获得的类型学: 一个分析框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4).
- [14] Esherick, Joseph W. 1986.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5] Lee, Lai To, and Hock Guan Lee. eds. 2011. Sun Yat-Sen, Nanyang,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16] Zheng, Xiaowei. 2018. The Politics of Righ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Stanford.
- [17] Veselova, L. S., and Neng Liu. "Life and Scientific Work of Chinese Outstanding Sociologist Fei Xiaotong." Asian and Africa Studies, 2018 (2): 269-284.
- [18] 费孝通,王同惠. 花篮瑶社会组织[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 [19] 费孝通. 桂行通讯. 费孝通选集[M].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
- [20] 谢泳. 魁阁: 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J]. 北京大学学报,1998,(1).
- [21] 费孝通. 初访美国. 费孝通游记: 初访美国·访美掠影·重访英伦[M]. 东方出版社,2007.
- [22] 费孝通. 小城镇 大问题[J]. 瞭望周刊,1984年1月.
- [23] 费孝通. 孔林片思[J]. 读书,1992,(9).
- [24] Chang, Kyung-sup. 2011. South Korea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 Famili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ransition. Routledge.
- [25] Liu, Neng. 2017. "On Chinese Temporalities". Temporalities, 2017 (26): 1-7.
- [26] 费孝通. 生育制度[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 [2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三联书店,1985.
- [28] 费孝通. 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费孝通学术文化随笔[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 [29] 费孝通.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J]. 北京大学学报,1997,(3).
- [30] 费孝通. 文化自觉 和而不同[J]. 民俗研究,2000,(3).
- [31] 费孝通.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费孝通全集[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黄杰

## From Village Livelihood to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Fei Hsiao-Tung and the Sociolog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LIU Ne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writi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prominent feature of Fei Hsiao-Tung's academic thoughts has been his concern and reflection on China's destiny in the process of diachronic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use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an entry point and incorporate Mr. Fei's concern about the destiny of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diachronic globalization into a specific temporal-spatial sociologic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ation. The article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following five historical phases: 1) 1911 [1840]—1949, the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stage and early modernization in China, corresponding to Mr. Fei's early studies on village livelihood (represented by his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and three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2) 1949—1978, a stage of institutional isolation lasting 30 years (as well as the multiple structural sacrifices that underp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fate of sociology as a bourgeois subject that was cancelled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important social practice of the time; 3) 1979—2008, the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hina's re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the development model theory proposed by Mr. Fei (the main theoretical element is the diversity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s); 4)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s a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the reduction of Chinese paradox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skepticism), corresponding to Mr. Fei's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strategy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for the rise of Chinese modernity based on the two concepts of cultural appreciation and cultural acceptance; 5) fro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system reconstruc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continuation of Mr. Fei's strategic thinking, namely how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in the post-Fei Hsiao-Tung era in order to truly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village livelihood; cultural awareness; Fei Hsiao-Tung; diachronic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sacrifice; institutional isolation